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看《灿烂千阳》

黄文姬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灿烂千阳》小说以两位女主人公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批判了代表男权意志的阿富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本文拟从后现代女性主义角度来解读胡塞尼的《灿烂千阳》，结合后现代女性主义主体观、身体观、话语观和权力观理论分析《灿烂千阳》中体现出的阿富汗女性所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灿烂千阳》；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24-000235-03

阿富汗裔美国小说家卡勒德·胡赛尼是近年来在世界文坛上颇受瞩目的一位作家。《灿烂千阳》是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二部作品。《灿烂千阳》以平和温婉的写作手法描述了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底层阿富汗女人因为命运的作弄而不得不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的凄凉、悲惨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灿烂千阳》通过女性视角来审视女性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女性主义文本特征。

女性主义自18世纪出现、形成演变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后现代女性主义因鲜明的理论观点和特征开启了女性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主义加后现代主义^[1]。它的出现并不是女性主义随意照搬或套用各类后现代学术概念的简单结果，而是女性主义从女性立场经验出发，并以女性独特的思维表述方式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男权制文化的批判，通过建构一套关注差异、强调多元的女性话语体系来颠覆男权主义秩序，并根除传统女性主义父权思维影响的复杂产物^[2]。通过援用、契合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后现代女性主义消解现行的男女两性观念，解构男性中心主义，重构女性话语，构建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男女两性和谐共进的模式。

《灿烂千阳》以玛丽雅姆和莱拉两位女性的人生轨迹为线索，从身体、话语、权力、主体等角度对阿富汗女性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剖析，站在女性的角度向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发出拷问，体现了强烈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色彩。

一、女性身体的反抗

在女性主义眼中，“身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传统女性主义认为，男性与女性身体器官的差异决定了男女的差异。

后现代女性主义把生物学基础上的两性差异转化为社会的文化差异。在福柯看来，“身体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上有性别区分的身体，而且是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机器，一个能够在历史中被不断塑造的实体”^[3]。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各种纪律与惩罚就是为了维护男性权力，而强加在女性身体上。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呼吁重视女性身体的主体化，追求女性身体的自由和快乐。

在阿富汗社会中，极度男权使女性身体客体化、工具化。《灿烂千阳》中，拉希德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先后娶两位妻子的目的就是满足他的欲望并让她们生下男孩。当玛丽雅姆丧失生育能力后，莱拉第一胎生下女儿后，拉希德将她们视同废物，动辄拳打脚踢。拉希德要求玛丽雅姆和莱拉出门必须穿上布卡，通过布卡禁锢女性身体。这实质上是把女性身体对象化、工具化，当作任意摆布和使用的私有财产。

阿富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男权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力量，女性社会地位低下，这体现在女性身体成为社会统治和规训的对象。在拉巴尼和塔利班统治期间，要求妇女蒙面，严禁妇女在没有男性亲戚的陪同下出门，严禁妇女随意说笑等。这也是为什么拉希德敢如此猖狂地践踏女性，并叫嚣道，“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法院会为我所做的事情判我的罪”^[4]。身体的自由代表女性的自由，女性为反抗男性对其身体的控制是女性自由解放的重要一步，女性身体上的反抗促成了女性彻底的觉醒和解放。在《灿烂千阳》中，玛丽雅姆在忍受拉希德多年毒打虐待后，终于敢于反抗，她在身体得到解放后女性意识也得到觉醒。

《灿烂千阳》批判阿富汗社会普遍把女性身体客体化、工具化，重视女性身体的自主性、主体化。女性身体的自主化是瓦解极度男权社会的基础及重要途径。

二、男女差异的弱化

在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中，女性主义者要么是立足于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角度来提出女性的权利和利益，要么是以男性为标准来要求女性，寻求女性的解放和发展。这实际上都是父权制思维逻辑作祟的结果^[5]。后现代女性主义十分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等区别，并认为这些区别都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关，而是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的解释，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1]。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这种性别对立的思想是二元思维结构在性别关系上的体现，是造成父权制和等级制的基础，要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必须弱化两性差异，颠覆性别对立二元思维模式。

胡塞尼在《灿烂千阳》中首先塑造的是二元对立的男女性别形象。作者首先批判的就是这种传统父权家长制男性形象。拉希德和扎里勒是父权家长制男性形象代表。拉希德残暴践踏女性。扎里勒在娜娜怀孕后就抛弃娜娜母女，视她们为自己的耻辱。最后，拉希德和扎里勒不得善终，拉希德死在妻子玛丽雅姆的反抗下，扎里勒直到临终也未能求得女儿的原谅。娜娜是传统的受压迫的女性形象，她被扎里勒欺骗、背叛，为了生存与女儿，娜娜忍受来自扎里勒与社会的欺压，她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处境，但她仍拒绝玛丽雅姆接受教育，在男权压迫下变得麻木、不敢反抗。拉希德、扎里勒和娜娜都是单一的二元对立的传统两性形象，作者对他们采取批判态度。

同时，《灿烂千阳》描绘了颠覆传统标准的两性形象的人物。莱拉的父亲哈基姆是一个颠覆了传统标准的男性形象，他身材矮小，气质温顺。哈基姆的性格很温和，法丽芭把气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总是显现出“一副温顺迷茫的样子，看上去畏首畏尾的”^[4]。相反，莱拉的母亲法丽芭与传统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她总是拿丈夫出气，邋遢、肮脏，对任何事情不管不问。当战争袭来时，法丽芭不顾家人的安危，顽固地要坚守在儿子们奋斗过的土地上，最终夫妻双双葬身炮火。像莱拉父母那样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的两性关系，本质与传统父权家长制两性形象一样，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的忽视与“霸凌”。

《灿烂千阳》摆脱性别偏见，力图弱化两性间的差异。莱拉和塔里克的形象颠覆性别对立二元思维模式。塔里克与莱拉青梅竹马，他一直在她身边守护。塔里克勇敢、刚强，虽是一个独腿男孩，但他并不自卑，他还曾卸下他的假腿，用来追赶那些经常欺负莱拉的人。塔里克守信，在他们因战乱

分开多年后，塔里克仍实践诺言回来找她。同时，作者在塔里克身上注入了诸多不同于传统男性形象的特质，如体贴、温柔、重感情等，模糊了两性的界限，突出了人物独特的个性。莱拉身上也有许多不同于传统女性形象的特质。莱拉志向远大，爱好读书，即使在丈夫拉希德的淫威下，莱拉依然坚强，并想方设法逃走。之后，在她与塔里克离开阿富汗一年后，她与塔里克回到故乡喀布尔，共同投身于阿富汗的重建。作者力图弱化两性间的差异，突出塔里克和莱拉作为个体，而非男女的特性。

《灿烂千阳》批判传统父权家长制的人物以及颠覆传统标准的两性形象的人物，力图弱化两性间的差异、摆脱性别偏见的束缚。两性二元对立的模糊、消失是男女平等的重大进步。

三、男女话语的重构

女性的自由解放是女性主义的不变主题。尽管传统女性主义试图打破这种“父权制”话语，但无建构女性自己话语的意识。后现代女性主义将研究问题的重点从关注父权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转向对话语的研究，开拓女性话语的建构。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拥有了权力。话语系统的转换必然会引起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因此，为了反抗现有的秩序，就必须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从这个真正属于女性的话语系统中生产出女性权力，从而争取建立两性平等。后现代女性主义怀疑男性话语的合法性，以女性喊出属于自己的话语为目标。

在《灿烂千阳》中，最初权力一直掌握在拉希德手中，拉希德通过他的话语实施他的权力，玛丽雅姆一直被男权话语打压着。玛丽雅姆随拉希德到达喀布尔的德马赞区前，她从没有穿过布卡。到达德马赞区后，拉希德找了一系列的借口劝说玛丽雅姆穿上布卡。拉希德认为妻子们的穿着裸露是对丈夫名誉和尊严的破坏。他还坦白地告诉玛丽雅姆：“看到一个男人无法控制他的妻子，我觉得很不爽”^[4]。从未穿过布卡的玛丽雅姆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正是拉希德通过他的话语表达了他的权力，才让玛丽雅姆从此再也没有不穿布卡出门。通过拉希德的这些话语，“玛丽雅姆觉得这个男人的意志既强大又不可动摇，就像俯视着古尔德曼村的莎菲德山脉”^[4]。权力的实施要依靠话语的表达，拉希德的权力正是通过他坦白而严厉的话语实现的。玛丽雅姆话语的表达受到了许多限制，处于“失语”的状态。和拉希德生活在一起，玛丽雅姆“要容忍他和她说话的这种语气，承受他的指责嘲弄和辱骂，

忍受他把她当做一只家猫似的、视若无睹地从她身边走过”^[4]。玛丽雅姆从来不敢直接把她的想法表达出来。玛丽雅姆在家基本上不可以说得太多，因为稍不留神她的话就会引来拉希德的不满，甚至是严厉喝止。所以在拉希德的面前，玛丽雅姆是没有权力的，因为自由的话语都不在她的掌控范围之内。

玛丽雅姆争夺话语权的过程是非常艰辛和漫长的。“这么多年来，玛丽雅姆的日子并不好过”^[4]，饱经折磨与痛苦的玛丽雅姆依然控制不了面对拉希德暴力时的恐惧。“很多年过去了，当拉希德狰狞的向她笑着的同时又拉紧系在拳头上的皮带，双眼血红，透露着凶光的时候，玛丽雅姆依然害怕得浑身发抖”^[4]。拉希德要打死莱拉的时候，玛丽雅姆终于醒悟了，她发现她曾经是那么的愚蠢，她开始反思长期屈从于父权话语给她及她周围的人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她必须反抗，为了自己，为了莱拉。她终于喊出了属于自己的话语。“她喊了他的名字，她想要他看着，‘拉希德’，他抬起头，玛丽雅姆挥了过去”^[4]。玛丽雅姆从来没有这样有骨气地叫过拉希德的名字，“拉希德”这简短的三个字里，是玛丽雅姆自出嫁以来所受屈辱的爆发，现在，她终于敢为了自己的未来和拉希德做抗争了，最终她争取到了话语权，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灿烂千阳》号召女性建构自己的话语，通过重构男女话语系统来反抗现有的社会权力关系体系。

四、女性主体的觉醒

传统女性主义虽然也都曾致力于女性主体的建构，但是她们所强调的“主体”并不是建立在女性自身经验基础上的主体，而是父权文化下由男性界定的主体。这种主体的界定和构建无助于女性地位的真正改变。人的主体性表现在能够按照个人的意志或意图自由选择行动的能力上^[6]。后现代女性主义肯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认为女性只有在作为“人”的主体身份得到认同后，才能摆脱作为男性从属的边缘化地位，获得解放。

玛丽雅姆母亲告诫玛丽雅姆，像她们这样的女人只需要学会一种本领，那就是忍耐。所以玛丽雅姆向母亲提出想去上学，母亲拒绝并讽刺玛丽雅姆不要痴心妄想。玛丽雅姆失去教育的机会，也是失去了发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她从心底里接受了这个社会强加给她的枷锁，毫无主体意识，对一切灾难逆来顺受。玛丽雅姆的女性意识一直没有苏醒，她服从甚至从内心认同了男权的统治。相比之下，莱拉的父亲视莱拉的教育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在父亲的支持下，莱拉受

过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教育拓宽莱拉的视野，使莱拉冲破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使得莱拉更有主见、更具独立意识。

玛丽雅姆与莱拉的友谊使玛丽雅姆发生转变。她们互相倾诉苦难、舔舐伤口。在这过程中，玛丽雅姆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莱拉让玛丽雅姆在漫长的痛苦中，第一次感到被关爱。女性之间的关爱互助是小说《灿烂千阳》中女性觉醒的关键因素。玛丽雅姆常年生活在丈夫的虐待之下，她早已失去自我，但从莱拉和她的女儿身上，玛丽雅姆第一次找到了人世间的真情和坚持下去的力量。当拉希德要置莱拉于死地时，玛丽雅姆的女性意识终于惊醒。她在无尽的暴力中终于开始反思自己多年的服从和付出是多么愚蠢，她向拉希德反抗，“这是她第一次决定自己的生活轨迹”^[4]。《灿烂千阳》重视女性主体的觉醒的书写，呼吁女性寻找自我主体与女性之间的关爱互助。

结语

阿富汗文化一直是卡勒德·胡赛尼小说中重要的主题。阿富汗政权动荡和战争不断，阿富汗女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灿烂千阳》从女性视角出发，从身体、话语、权力、主体等角度对阿富汗女性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剖析，批判了代表男权意志的阿富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并试图提出解决阿富汗两性问题的方法，体现出极强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色彩。

参考文献

- [1] 李银河. 女性主义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 潘萍, 何良安.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生存方式 [J]. 浙江学刊, 2010, (4): 185-190.
- [3] 黄华. 权力, 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4] 卡勒德·胡赛尼. 灿烂千阳 [M]. 李继宏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5] 冯石岗, 李冬雪. 后现代女性主义概观 [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27(06).
- [6] 张广利, 杨明光. 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